



梁武帝與佛教

梁武帝（四六四—五四九）名蕭衍，字達生，原籍蘭陵（今山東省棗莊市嶧城鎮東），東晉初，他的祖先蕭整南遷到晉陵武進縣（今江蘇省常州市）境內，僑置蘭陵郡，故又稱南蘭陵人。他是南朝梁代的開國皇帝，在位長達四十八年。既是當時威勢顯赫統治者，也是博學多才，文武全能的人物。他三次捨身同泰寺，重視戒律，講經說法，並譯經注疏，護持三寶，在奉佛的帝王中是較為突出的。

梁武帝提倡佛教，在位期間幾乎以佛化治國，大致做了這樣六件事：

一、捨道歸佛，大弘佛法。梁武帝在「會三教詩」（「廣弘明集」卷三十上）中自述說：「少時學周孔，弱冠窮六經。」既學過儒教經典，又信奉道教，後來在齊竟陵王蕭子良門下，與高僧和信佛名士交游，深受熏染，遂捨道歸佛。他登上皇位

蔡惠明

的第三年，親率僧俗二萬人，在重雲殿重閣，發表「捨道事佛文」，帶頭示範，要求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，其原文說：「公卿百官、侯王宗族，宜返偽就真，捨邪入真，……願使未來世中，童男出家，廣弘經教，化度含識，同共成佛。甯在正法之中，長淪惡道。不樂依老子教，暫得生滅。」（「廣弘明集」卷四）實際上是欽定佛教為國教，運用政治力量，大弘佛法。

二、創建佛寺，塑造佛像。梁武帝親自敕建大愛敬、智度、新林、法王、仙窟、光宅、解脫、開善和同泰等寺院，雄偉巍峩，供養數以千計的僧尼，唐代詩人杜牧在「江南春」絕句中寫道：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」，描述了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佛寺之盛，據史籍記載當時佛寺達五百餘座。梁武帝

肉，皆而巧變了萬計以米萬計食三幣肉由皆爾，對案食與眾斷如瀾一寒生命，唯皇瀾不日降生，凡一寒生心榮封印重要者。吾「境開餅舖瀾肉煉」中，此題謂「寒生何以麻品」者大乘經文，謂「瀾瀾肉文」者，又對「即禁瀾肉食肉，將志者人王，景以學干不學無言。」此又對「即禁瀾肉食肉出要論」十四卷，合衆經內，嚴令頒行。此意蓋：「雖煙衣立對十八平既無瀾別受歟，若含淚歎。此煉命若欲飲五，對四、重瀾無窮，備瀾瀾肉，此一南史」卷六五，梁武帝

還大造金、銀、銅、石佛像，如同泰寺的十方金銀像、十方銀像，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，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、銅像，立像高十丈，坐像高五丈的剡溪石像等。梁武帝又倡建水陸大齋、孟蘭盆齋、「四部」無遮大會、無礙法善會等齋會，親自講經說法，宣佈大救天下。他在法會上還御製了「涅槃懺」、「大般若懺」、「金剛般若懺」等，倡導發露懺悔。

三、多次捨身，出家爲僧 據「梁書·本紀」載，梁武帝曾三次在同泰寺捨身，出家入寺爲僧衆執役。第一次是公元五二七年，時年六十四歲，即位二十五年；第二次隔二年，即五二九年；第三次又過了十八年，即五四七年、八十四歲。捨身時間第一次是四天，最後一次多至三十七天。表明他信佛的虔誠，並不留戀皇帝的寶座。

四、重視戒律、制斷酒肉 據「南史」卷六記載，梁武帝即位後十八年到無礙殿受戒，法名冠達。他敕命法超爲僧正，撰「出要律儀」十四卷、分發境內，通令照行。他寫道：「經教亦云，佛法寄囑人王，是以弟子不得無言。」他又依據「涅槃經·四相品」等大乘經文，親撰「斷酒肉文」等，反復闡明禁斷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在「與周捨論斷肉敕」中，他強調「衆生所以不可殺生，凡一衆生，具八萬戶蟲，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，若斷一衆生命，即是斷八萬戶蟲命。」以大悲心勸令僧侶遵守斷酒肉，從而改變了漢代以來漢僧食三淨肉的習慣，使素食與戒酒成爲漢僧的優良傳統。

五、支持譯經、講經說法 梁武帝即位不久，就命來華的扶南（今柬埔寨）沙門曼陀羅、僧伽提婆共同譯經，他時而親臨法座，筆受其文。著名的天竺佛經翻譯家真諦也從扶南應梁武帝的邀請而東來。他譯出的有關大乘瑜伽宗的經典很多，其中「攝大乘論」對我國佛教思想的發展很有影響。另據史書記載，梁武帝

在第一次捨身後，經常舉行數萬人的法會。自己高升法座，爲僧俗宣講「大乘般若涅槃經」、「摩訶般若婆羅蜜經」和「金字三慧經」等，提倡佛學，盛極一時。

六、勤於著述，延僧注疏 梁武帝博覽經書，見解卓越，他寫了很多重要的佛教論文。據「梁書·本紀」載，他制「涅槃」、「小品」、「淨名」、「三慧」諸經義記，復數百卷。即「制旨大涅槃經講疏」一〇一卷、「大品注解」五十卷、「三慧經講疏」、「淨名經義記」、「制旨大集經講疏」十六卷、「發般若經論義並問答」十二卷，另有「立神明成佛性義記」、「淨業賦」、「注解大品經序」、「寶亮法師制涅槃義疏序」、「金剛般若懺文」、「摩訶般若懺文」等大部份收入「弘明集」、「廣弘明集」中，有一部份佚失。

梁武帝還延請名僧撰寫注疏，如請寶亮撰「涅槃疏」，命建元、法朗撰「涅槃經注」，又延僧旻等編纂「象經要鈔」八十八卷，請智藏纂集衆經義理輯爲「義林」八十卷，命寶唱抄撮「經律異相」五十五卷及纂集佛教傳承後僧俗發揚佛理的著作成「續法門論」七十卷。梁武帝還三次敕編有關佛經目錄，最後一次由僧祐撰的「出三藏記集」，是我國較古而較完善的經錄。

梁武帝的佛學思想，也形成系統，對後世佛學研究影響廣泛，概括地可分這樣兩個方面：

一、創立三教同源說 梁武帝在「捨道事佛文」中說：「大經中說，道有九十六種，唯佛一道，是於正道，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。朕捨邪道，以事如來」。該文說老子、周公、孔子之教，都源自佛法。把佛教比作月亮，儒道喻爲衆星，既有高下區別，又互相烘托，交相輝映。他在「會三教詩」中稱：「窮源無

二聖，測善非三英，指出佛教是本源，是至聖、至英，而儒道則起輔助作用。他認為，儒道「化迹既邪，止是世間之善，不能革凡成聖。」而要超凡入聖，必須借重出世間法的佛教。這三教同源說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強調三教的同一性，合而為用的表現。

二、主張「真神佛性論」，梁武帝在「為亮法師制涅槃經疏序」中說：「舉要經論，不出兩途，佛性開其本有之源，涅槃明其歸極之宗。」涅槃佛性說是講成佛的原因，根據和主體的問題，是他最為關注，探討最多的問題，也可說是他的佛學意思基本內容。他主張的「真神佛性論」是南朝時代各種涅槃佛性說中極為重要的一派，而他正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。

佛教般若學在兩晉時代得到廣泛傳播，但偏於講空，忽畧於成佛根據和主體等問題的論述，使急於成佛的教徒得不到滿足。東晉後期，「涅槃經」譯出，一些學者就轉向涅槃妙有的學說。道生大師就是由般若學轉到涅槃學的傑出代表，到了南朝，涅槃學取代了般若學，居於主流派的地位。梁武帝在「注解大品經序」中概括有四種說法，其中最重要的觀點是，涅槃是究竟，般若非究竟。梁武帝不同意這種觀點。他在重視「涅槃經」的同時，也很重視「般若經」，曾作「大品注解」五十卷，他在「注解大品經序」中認為：「般若波羅蜜者，洞達無底，虛豁無邊，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，不可以數術求，不可以意識知。……此乃菩薩之正行，道場之直路，還源之眞法，出要之上首。」指出般若智慧是通向成佛的眞正的途徑和方法，他又認為「涅槃是顯其果德，般若是明其因行。顯果則以常住佛性爲本，明因則以無生中道爲宗。以第一義諦言說，豈可復得談其優劣？」明般若因，故以萬事萬物無生無滅的無生觀畢竟空爲宗旨；顯涅槃果，故以永恒常住佛性爲根本。涅槃佛性說是和般若空觀互相聯繫，互相補充的。宇宙萬物畢竟空寂，而包括人在內的佛性則永恒

常住。

涅槃學的核心是關於佛性學說，有十一家、十三家、六師之說。概括可分兩類：一類是從人的主觀方面即心性方面去立說的；一類是從人所面臨的客觀方面即怎樣理解、把握客觀世界的眞實本體去立說的。梁武帝屬於以眞神爲佛性的一派，在「立神明成佛義記」和「淨業賦」等中他對「眞神佛性論」作了全面的闡述，其主要論點是：（一）神是象生異於木石的本性。就是說，神（眞神、心神）是和木石等無情之物不同的有情象生先天具有的。神靈不失之性，就是象生的佛性，也即象生成佛的基本原因和根據。（二）神分性和用兩個方面，「心爲用本，本一兩殊，殊用自有興廢，一本性不移。」心靜則心淨，心動則心垢。如果心不感物外動，內心就明；也就是由無明轉變爲明，進而就可成佛。（三）神的本性是恒常不滅的，梁武帝認為：「源神明以不斷爲精」，「神明性不遷。」就是說，同是一個人的心，既能生重惡，又能起妙善，善惡是根本對立的，但是生起在同一個心上，說明心識的本性、本體是共同的；心的善惡生滅交替，而心作爲本性，本體是永恆不變的。（四）神是輪迴果報的主體。梁武帝深信「因果有必定之期，報應無遷延之業」，他把神不滅論和佛教的因果輪迴學說結合起來，認爲不遷、不滅、不死的「神」是承負輪迴果報的主體，實現由愚轉智，由凡轉聖。「既除客塵，反還自性，三途長乖，八難永滅。」這樣也就超出輪迴流轉而成佛。

雖然梁武帝不遺餘力地提倡佛教，但他並不是「眞爲生死，發菩提心」，因此他的行善僅有福德，却無功德。當時佛教的盛行。也只在歷史上一閃而過，未能深入而持久。梁武帝自己最後於「侯景之亂」中喪失應變的能力，竟在被困期間毫無辦法，束手待斃，這當然是他自身的業報。但佛教有了這一穩實的基礎，終於引發下隋唐時代的振興和發展。梁武帝的功績，也是不容抹煞的。